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与经济

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

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

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

阎书钦 著



新經濟

半月刊

第一期目錄

論文

經濟的使命

論國力的發展

經濟與政治

經濟與文化

經濟與教育

經濟與藝術

經濟與宗教

經濟與法律

經濟與道德

經濟與宗教

經濟與法律

經濟與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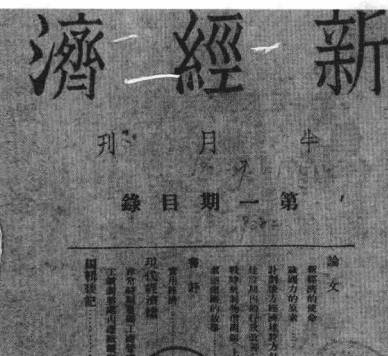
国家与经济

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

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

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

阎书钦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
阎书钦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

(中国近代史学博士论丛)

ISBN 978-7-5004-8894-1

I. ①国… II. ①阎… III. ①经济发展—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F129.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506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颀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康道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459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2006年6月4日，我参加了我的老同学清华大学历史系蔡乐苏教授的学生阎书钦的博士论文答辩，由此认识阎书钦。当时，阎书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经济建设思想研究》，其主要内容是考察分析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国家建设问题的认识和见解，论题颇有新意，论述也较精到，获得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对于我来说，由于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对阎书钦的这一研究课题自然很感兴趣，也关注着它的出版问世。现在，阎书钦已完成了对自己博士论文的精心修改，在即将正式出版之际，盼我为之作一序言。我对这一课题虽然很感兴趣，但没有什么研究，也知之不多，权且以第一个读者的几点所感所想，充作“序言”。

现在，阎书钦奉献给读者的著作，其题目是《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以〈新经济〉半月刊为中心》。这也即是说，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经济》半月刊，其研究的主体内容是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其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揭示国家与经济的关系。

近年来，以一个报刊作为对象的研究多有所见，如《大公报》、《申报》、《独立评论》、《少年中国》、《现代评论》、《益世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努力》周报等都已有多少不等的研究成果问世，它们都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阎书钦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新经济》半月刊是一个经济刊物，所采取的研究视角也是经济思想史的视角，

开辟了同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而且,把研究对象从《新经济》所刊文本本身扩大到作者群体,又以作者群体为线索,延伸到与该作者群体密切相关的汉口的《大公报》和重庆版《大公报》、《经济建设季刊》,以及他们的其他著作,从而既提高了考察该作者群体所持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也扩大了分析有关问题的视野和背景,使研究所得更加接近事实。这种因刊及人,又因人及刊、及书的研究方法,颇有创意,当然也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问题,阎书钦考察了以《新经济》半月刊作者群体为核心的国统区知识界的有关言论,归纳出他们所讨论的主要内容集中于中国需不需要走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以及如何走这条道路的问题。前者涉及了知识界如何认识现代化和工业化,如何选择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后者涉及了知识界对处理农业与工业关系,采用什么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如何利用外资的主张。所有这些,既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史中的重要问题。以往,在有关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对工农业关系问题和经济体制问题有所论及;在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中,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思想也有所论述。阎书钦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更集中的时间段、更完整的考察面研究了这一问题,从而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思想的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深刻性,也将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知识信息。

阎书钦在本书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思想的研究,在对以往较有研究的内容作更为细致的考察之外,还拓展了以往相关研究较少涉及的内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各种思想的异同所在、内在原因和彼此联系,以及它们发展变化来龙去脉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人的现代化、工业化理念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如国人对现代化含义的理解,是如何从简单的西化过程向中西双向改造、彼此融合的过程转变的,是如何从单纯的文化问题向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社会经济问题演变的?对现代化过程中工农业关系的认知,是如何从对立、主次的观念向兼顾、并重的观念扩大的,是如何从彼此地位的考察向互相依存的审视深化的?对工业化的理解,是如何从单纯的机械化向整体经济变革进展的,是

如何从知识界的理论探讨向学、政、工、商各界的基本共识发展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阎著中关于知识界对工业化与社会改造关系讨论的考察，作者虽然只设一个专目考察这一方面的内容，但其学术含量则十分值得重视。就笔者所见，这似乎是有关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想史研究中首次涉及的内容。笔者曾在《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上刊有《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一文，为了明确界定现代化史的研究对象，提出“现代化史研究的总体对象是工业社会史”。这是因为现代化社会虽有除工业化之外的众多社会经济指标，但实际上其他各种指标都是工业化的派生物，都是随着工业化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它们与工业化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工业社会，所以，现代化史研究的总体对象就是工业社会的各种特性及其发展变化。换句话说，现代化社会是被工业化改造而成的工业社会，工业化的产生、发展和实现也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的相应改造。后来，在河南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现代性基本读本》（汪民安等主编）中，看到了一个外国学者在前些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工业社会史研究的文章，以为与本人不谋而合。看了阎著之后，笔者第一次知晓在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现代化思想已开始涉及这一理论问题，他们所讨论的工业化与社会改造问题，虽然尚未从现代化史研究对象和工业社会建构的高度来认识这一问题，但其中已蕴含着这种元素。他们在讨论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工业化与社会的工业化变革、以工业化为导向的社会改造、工业化的社会整体改造意义、企业家的精神、工业化的精神、工业化的道德、工业化的心理、工业化的文化、技术观念与社会意识和生活态度、现代工业文明等。作者对于这些内容的论述虽然尚较简单，但为这一问题的研究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也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关于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中都会涉及的问题，不过，把它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来研究尚不多见。阎著所考察的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关于抗战时期及抗战胜利后中国应如何建设，如何才能走向富强的思想。作者不仅对前人已有较多研究的“以农立国”论和“以工立国”论的内涵演变作进一步的深入考察外，而且通过梳理知识界对国家建设与现代化、工业化关系，以及抗战与国家经济力量关系、中日经济力量对比的各种认识，呈现了知识界乃至社会各界把现代化、工业化作为

增强国家经济力量,建设战后中国必由之路的基本共识,以及如何进行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的各种见解。这些内容,有助于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抗战时期知识界在现代化、工业化问题认识上所达到的广度、高度。

在思想史研究中,常见的现象是就思想论思想,大多停留在文本思想的层面上,较少考察思想的实际社会影响。在这方面,阎著做了一些努力,在其所考察的知识界的参政议政情况中,可以看出知识界的经济建设思想对政府经济建设思路和方针的某些互动关系,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趋同和分歧所在,既可以从其趋同之处看到前者对后者发生影响的一面,也可以从分歧之处看到难以发生影响的一面,还可以看到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走向经济上垄断和政治上独裁的思想理论根源。当然,在思想史研究中,研究思想的实际社会影响是难度最大的,对阎书钦来说亦是如此,他虽然经过努力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成绩,但在这方面还显得不够突出,论述也比较单薄,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上述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不足以反映阎著的全部内容和学术价值,其中的精华所在和不足之处,自然需待读者的鉴别。不过,在鄙人看来,本书虽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部值得一读的著作,尤其是对关心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的人来说,更是一部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著作。

中国现代化思想史,是一个缺少研究的课题,阎著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做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可喜可贺。但愿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有更多的后起之秀出现,有更多、更优秀的著作问世,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思想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展现。

虞和平

2010年2月28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序 二

2002 年秋，阎书钦从河北省社科院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我和我的几位同事正在研究过去清华历史系的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系主任蒋廷黻。研究中发现，蒋廷黻在抗战中参与创办的《新经济》这份似乎早已被人遗忘的刊物很可能是个值得开采的“富矿”，需要有人去深入耙梳整理研究一番。我想，这个任务交给阎书钦比较合适，他来清华之前对中共党史资料文献已比较熟悉，如果对南京、重庆方面也能有较深入的了解，那他对中国现代史的观察就比较全面了。果然未出所料，这位略带几分燕赵豪气的年轻学者二话没说就欣然答应了。实际上，我把这样的任务交给他的时候，在许多方面我心里是没底的，因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刊物的作者群体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在讨论一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有无彼此内在的融贯相通的逻辑；也不知道这些作者在此刊之外还在哪些刊物发表相关议论。另外，他们与国民政府是随声附和呢，还是若即若离，有一定的独立意识？他们的言论对于今天的人们是否还有产生共鸣的可能？我只知道《新经济》的分量很大，需要一个人集中精力沉潜几年才能有个真说法。我当时能告诉阎书钦的，除了快速查清中国现代思想史中有关抗战时期知识界讨论经济问题的学术成果的详细情况之外，就是让他直接去读《新经济》原刊，人物可先从蒋廷黻、吴景超、翁文灏等入手；头绪可先从“艺文研究会”和“艺文丛书”入手；人际交往的史事掌故可从《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入手。阎书钦是个实在人，读书如痴，不分昼夜，颇有韧劲。几年下来，他的读书笔记超过百万字。他不仅通读了《新

经济》，还通读了武汉、重庆时期的《大公报》和同时期几种直接相关的经济杂志；理清了《新经济》作者群体中几乎所有人的学历、身份及其学术理论成果和基本观点；找出了以《新经济》为中心的一群任职于国民政府之中或与之有密切关联的、大多以留学英美为背景的知识精英关于战前、战时、战后经济建设的逻辑思路。如期完成了他的资料扎实、开拓性凸显的博士论文，得到隐名评审专家和论文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2006年，清华大学奖励他的论文为校级优秀博士论文一等。现在这本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充实、提炼而成的，我读完后感到它比原来的博士论文的确显得更加通顺畅达、精神焕发了。

思想史的著述一般不易脱出几种传统的表达范式：或者按思想家一个一个地分别介绍；或者按思想流派一个一个地分别介绍；或者按思潮的起落分时期、分阶段地分别介绍。无论哪种类型的介绍都会在开头或是中间戴上一顶统一的、同时也是笼统的时代背景的大帽子，这就算是知人论世了。我以为，这样的思想史是容易走向断章取义、扭曲前人思想的歧路的；同时，这样书写出来的思想史，思想家思想的火花、思想的锋芒、思想的独特性亦不易显现，容易变得死气沉沉，就像孩子们搭积木一般，板块与板块的连接，构不成有机错落的、生动活泼的思想交锋局面。我称此种类型的思想史为“死”知识的思想史。我更欣赏的思想史是与之相别的“活”的思想史。什么是“活”的思想史呢？最关键的就是能设身处地弄清、理解思想者发语的真正的、具体的针对目标。如果能找到发语者的真实目标，思想交锋的场景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就好比阳澄湖边那座小茶馆里阿庆嫂与胡传奎和刁德一的“智斗”一样。从那样活生生的、系人心魄的场景去理解发语者的思想才是最真实的。如果离开那活生生的场景，单独来看阿庆嫂或刁德一的某段唱词，那就肯定不是那个味儿了。阎书钦这本书稿，从方法上说，是力求体现“活”的思想史的特色的。作者从考析“艺文研究会”的前台幕后入手，理着抗战局势发展的主脉，将国际、国内有机联系起来，把各思想者发语的时段、场景、论题、目标一一交代得清清楚楚。整本书稿围绕着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后如何工业化、现代化，尤其是如何进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论题，将当时知识精英们审时度势、各抒己见的思想史宏阔壮境，层面清晰、逻辑连贯地再现出来了，使读者切

切实实感到思想史是一种活脱脱的滚动态势，在这样的态势中，思想者的言语会自动闪发光彩，人为的断章取义必与其本相凿枘难融。

中华民族八年浴血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收获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成果。以往人们都认同这份巨大成果就是：一方面是全民族团结抗敌的爱国精神和国民意识的普遍提升；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起来，终于使中国近代每况愈下的历史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现在从阎书钦的研究来看，我们有理由这么说：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不只是那两个方面，它还有第三大成果，那就是抗战期间知识精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但不幸的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干扰，遂使有些近乎成熟的复兴中华民族的经济建设理论成果长期沉睡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而无人问津，亦不敢问津，直至临近忘却的地步。许多本来快要成为常识的道理硬曾遭到无知者的严打痛批，以致到后来要费那么大的气力另起炉灶般“创新”经济建设理论。多么深刻的教训啊！阎书钦在他书稿的末尾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所涉及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国营经济与民营经济、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等内容，均为中国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它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至今尚未泯灭！

近两年来，阎书钦的研究成果已在重要刊物或学术会议上发表了六七篇，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我不仅赞同他发表的学术成果，而且希望他的研究所得能以整体的面貌早日面世，好让世人更完美地感受到伟大的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早已埋下了现代化经济建设全面深入探讨的思想种子。谨序至此，余不赘言，祈同仁正之。

蔡乐苏

2009年12月15日于清华园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新经济》半月刊的创办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	
学者从政潮流	(1)
第一节 办刊缘起与学人从政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42)
第二章 战争情势下对现代化、国力、经济、建国的反思	(55)
第一节 20 世纪 30 年代知识界现代化理念的形成	(55)
第二节 国力与经济:战争环境中对现代化的反思	(73)
第三节 此建国与彼建国	(88)
第四节 现世关怀与国家观念	(106)
第三章 工业化: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125)
第一节 工业与农业	(125)
第二节 战争与工业化理念的确立	(168)
第三节 工业化与工业社会	(184)
第四章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	(204)
第一节 苏联与德国:中国学习的榜样	(205)
第二节 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理解的歧异与纷杂	(228)
第三节 自由经济: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质疑与反思	(253)

第五章 国营,还是民营:一个难解之题	(292)
第一节 国营与民营并存的三民主义“混合经济”形态	(292)
第二节 重工业国营,轻工业民营:划分国营与民营经营 范围的论争	(313)
第三节 经营效率:国营事业的核心问题	(340)
第六章 利用外资与对外贸易:战后建设的讨论	(356)
第一节 世界大势与问题的提出:国际经济合作与战后建设	(356)
第二节 利用外资:建设资金的筹集	(371)
第三节 自由贸易还是保护贸易:中国新兴工业的保护问题	(407)
结语	(429)
参考文献	(435)
后记	(449)

第一章

引言：《新经济》半月刊的创办与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学者从政潮流

许多历史，也许曾经暂时移出今人的视界，但是，作为今人的我们却没有理由遗忘。尤其对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这一点更具有警世意义。或由于今人研究的不充分，或由于诸多人为的研究导向，或由于资料的浩繁，许多民国时期诸多本来充盈史学价值的历史图景，却长期淡漠于今人的脑际，甚至消失于今人的视界。然而，其所具有的历史光芒，可以暂时被今人所忽略，却终有一天会被人们寻回。否则，被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历史，将是残缺不全，甚而是不真实的。由此意义而言，中国近代思想史，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之所以至今形不成一个全面、客观的研究体系，我们不能不说，一些研究对象的历史价值被过分扩张，而另一些历史内容却长期处于失语状态，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抗日战争前后的思想史，这种研究态势尤其明显，一些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轨迹或整体思想体系的要件，长期被今天的研究者忽略。由此点而言，今天所写的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抗战前后的思想史，乃是一部尚不完整的思想史。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界曾对工业化、经济体制等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时期、热烈的思想论争。作为整体中国近代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们在此方面的理论探讨却长期被历史研究者忽略。本书的要旨即在于努力寻回这一知识分子群体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尽力还原其历史本相，诉说其丰富而生动的思想内涵，让今天的我们感知其充满魅力的

思想丰采。《新经济》半月刊作者群体上承 20 世纪 30 年代《独立评论》知识分子群体,在国统区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探讨中具有核心意义。所以,笔者首先对《新经济》半月刊及其作者群体作一个系统介绍。

第一节 办刊缘起与学人从政

《新经济》半月刊是怎样一份刊物?它拥有怎样的作者群体?简而言之,《新经济》半月刊于 1938 年 11 月由蒋廷黻、翁文灏、吴景超、陈之迈、何廉、陶希圣等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中任职的所谓“学者从政派”在重庆创办。自 1938 年 11 月 16 日出版第 1 卷第 1 期,至 1945 年 10 月 1 日出版第 12 卷第 6 期为止,共办了 6 年零 11 个月,出版凡 138 期。其作者主要由两部分人士构成,一是任职于国民政府经济部、行政院政务处等部门的从政学者,二是仍在各大学、科研机构教书、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界人士。

一 从艺文研究会说起

《新经济》半月刊,虽然与 30 年代由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翁文灏、吴景超、陈之迈、张熙若、何廉、周炳琳、周诒春、陈岱孙、顾毓琇、吴宪、张忠绂、徐炳昶、张佛泉、陈序经、董时进、郑林庄等组成的《独立评论》士人群体^①有直接相承关系,但是,随着 1937 年七七事变的爆发、《独立评论》的停办,这些人生境遇和志向,由于抗战初期中国东部地区的大部沦陷,国民政府和各大学、文化学术机构的纷纷西迁,均发生剧烈变化。他们的工作职守和地区,由北方、东南而西南,由学校而行政机关,均有巨大的转换。抗战初期,这些知识界士人有一个重新汇聚的过程。在由《独立评论》到《新经济》半月刊的重新汇聚过程中,有一个极少为今天研究者注意的组织,起了重要的促进

^① 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第 34 页。

作用。这个组织就是艺文研究会及其进行的“艺文丛书”的筹划、编辑和出版工作。

艺文研究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至今依然扑朔迷离。最早,周佛海在其日记中对艺文研究会曾有过零散而片断的记述。从《周佛海日记》来看,周佛海直接指导着艺文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该会的各项决定和行动计划都是在他与陶希圣的商量下作出的。如周佛海称:1938年5月8日,“希圣来商《中央日报》问题,及整理艺文研究会办法。余提议以李厚徵(原任南京新闻检查所主任秘书),希圣亦赞成”。5月20日,“午偕希圣宴艺文重要干部于味腴”。6月11日,他与该会秘书李厚徵商量艺文研究会人员从武汉疏散办法。7月13日,李厚徵又找他谈艺文研究会事务。艺文研究会搬到重庆后,周佛海更密切地指导该会事务,诸如该会的编制、预算、编审组工作细则都是在他与陶希圣等人的直接商量下决定的,而且,艺文研究会成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的聚会场所。周佛海于8月19日接见该会所属人员。8月26日,他又“约希圣及艺文重要干部,商推进办法”。8月28日和29日,他又连续两天“处理艺文研究会各事”。8月30日,他又与该会总务主干罗君强谈艺文研究会编制及预算。8月30日,他又“核阅艺文社预算”。9月2日,他又“核阅艺文社编审组工作细则”。10月26日,他又“赴艺文会与思平、希圣商各项问题”。^①

与周佛海一起负责此会工作的陶希圣,曾于1963年3月1日在《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的《东战场与武汉》一文中披露该会情况,但语焉不详。他只是说,“我与周佛海创设了一个团体,名为艺文研究会。这个会得到各方的支持,筹集资金。它联络了武汉的报纸,创办了几种期刊,成立了出版机构,资助了向后方移动的学术文化界人士,并且派出一些同志到后方大城市设立分会”。由此可知,艺文研究会是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佛海和陶希圣共同负责。关于艺文研究会的宗旨,陶希圣只是说:“这个会的纲领提出了‘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内求统一,外求独

^① 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98、111、123、140、144、145、146、147、176页。

立’和‘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口号。这些口号就是书刊的宣传宗旨。”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显然含有强烈的拥护国民党的抗战宣传意味。陶希圣又接着介绍说，艺文研究会还邀集武汉各民众团体和各报负责人召开座谈会。他在会上经常发言：“警告党中同志：‘受降如受敌。党员必须随时准备斗争，并且经常斗争。党员守住战壕，党的中央才能容共。若是每一个党员都去联络共产党，那就是本党解体以至消灭的一条路。’”^①陶希圣此说与中共进行思想斗争的意味颇为强烈。一个月后，陶希圣又在《乱流》一文中继续介绍艺文研究会的情况。他介绍，汪精卫是艺文研究会工作的“热心指导者”。艺文研究会设立后，陶遇事都去向汪请示：“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去见他。”由陶希圣此说，似乎艺文研究会直接由汪精卫领导。陶希圣还介绍，艺文研究会曾在香港设立分社，对外称“国际问题研究所”，由梅思平主持，“他们的工作是选择外围报纸刊物的资料，或剪报，或摘译，寄到武汉，供总会参考”。他又介绍，1938年9月底，艺文研究会迁往重庆。陶希圣也于当年10月到重庆，会址设在菜园坝。陶希圣就居住在会内。^②陶希圣于1963年3、4月间只是对艺文研究会作了一个简要介绍，并未作深入说明。1986年10月至年底曾在美国华盛顿听高宗武回忆往事的周谷，把艺文研究会说成是周佛海、陶希圣等在南京组成的“低调俱乐部”在武汉的“对外公开”组织。^③从以上材料来看，似乎艺文研究会有强烈的汪系色彩。

然而，艺文研究会的真正发起者，并在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蒋介石。1978年12月，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称：“南京撤守，汉口天津街艺文研究会，对国际政治及问题之研究报告，有时摘要报告汪精卫。汪时为副总裁，抑或摘报蒋委员长。”该会香港分会“所得情报，送交本会，亦循上述途径，报告汪并转报蒋委员长”。可见，艺文研究会不仅对汪

① 陶希圣：《东战场与武汉》，《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1963年3月1日，（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发行，第8页。

② 陶希圣：《乱流（上）》，《传记文学》第2卷第4期，1963年4月1日，第6页。

③ 周谷：《高宗武笑谈当年事》，《传记文学》第66卷第4期，1995年4月10日，第66页。

精卫负责，同样也对蒋介石负责。^① 关于艺文研究会的情况，曾任该会总务主干的罗君强也有过相对详细的回忆。由于罗君强也是该会的亲身参与者，或许他的说法也相对准确。据罗君强回忆，国民政府退至武汉以后：“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的心目中，非常害怕国共重新合作后中共在文化宣传上要占上风，并乘机扩充地盘和军队。所以，周佛海、陶希圣等就献策，赶快搞一个暗中和中共对抗的中性文化团体，来执行反共任务。蒋、汪同意，就成立一个‘艺文研究会’，任命周佛海、陶希圣为平行的总干事（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研究总干事）。其主要组织成员如次：秘书李厚徵（留苏学生，邓文仪系统），总务主干罗君强（以后李他调，由罗兼任秘书），编审组主干陶希圣兼，出版组主干叶溯中（CC分子）。另外，还有两个组，是否叫‘文化’、‘青年’记不清了，其主干是刘炳黎（复兴社分子）和刘百闵（CC分子）。”“艺文研究会主要是以付稿费名义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多些。我记得拿过钱的有：叶青（任卓宣）、郑学栋、李圣五、梅思平、姚蓬子……对于当时甘做国民党尾巴的（青年、国社）两个小党，由蒋介石密谕每月由该会各津贴三千元。青年党由左舜生具领，国社党由张君勱具领。”“该会也出资津贴别人在各地办小报，如上海的樊仲云、湖南的易君左等。会中还出过一种艺文研究丛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主编人陶希圣等，大约印过四五种。”“周佛海、陶希圣搞出一套口号，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这些口号完全是暗中对着中共而发。如说‘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解释为要团结，不要闹党争，不要搞摩擦。又如说‘抗战第一，胜利第一’，那就是一切要服从于军事的要求，要拥护最高统帅，从而引申到军令要绝对统一。”从罗君强的回忆来看，第一，这个组织是在周佛海、陶希圣建议下，由蒋介石、汪精卫共同批准的，并不是汪精卫的私人组织。第二，这个机构的直接目的是与中共争夺思想、文化、舆论阵地。第三，艺文研究会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套艺文丛书。罗君强还回忆：“汪精卫介绍他的亲信、立法委员林柏生到香港，为艺文研究会设立变相的分支机构，叫做‘国际问题研究所’，还是

① 陶希圣：《八十自序（上）》，《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1978年12月1日，第151页。